

常读·趣味集

旧闻奇谭

◆ 汗 青 主 编

晚清最后一次文字狱

丁戊奇荒：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

“公车上书”真相

复仇、帮会与中国近代社会

大汗丧命：钓鱼城改变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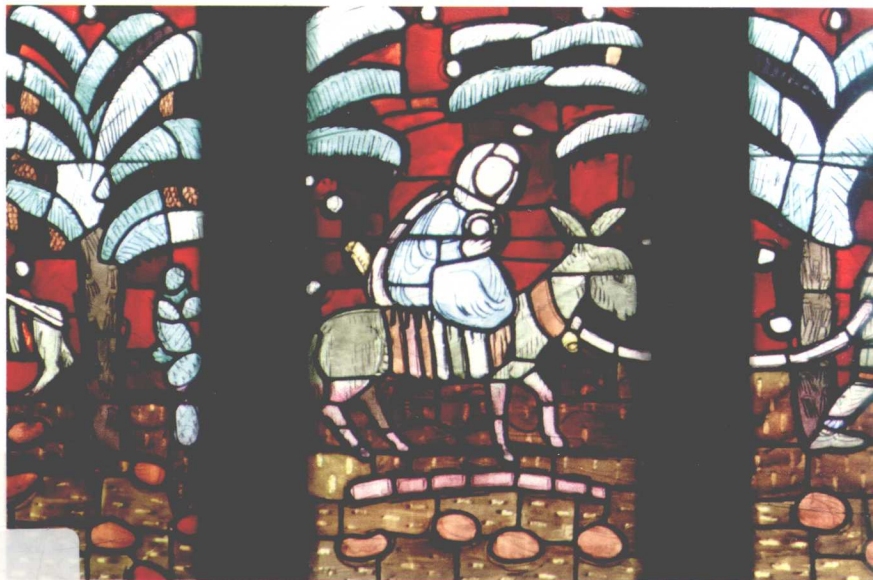
保卫襄阳：南宋的悲壮挽歌

十八路反王：造反派的隐秘圈子与往事

清朝的主奴制度与八旗

满族姓名趣谈

罗马与迦太基：双雄沉浮记



常读·趣味集
旧闻奇谭

◆ 汗 青 主 编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中国·成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闻奇谭/ 汗青主编. —成都: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 2017. 3
(常读·趣味集)
ISBN 978-7-5504-2723-5

I. ①旧… II. ①汗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世界②历史事件—世界 IV. ①K811②K1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8230 号

旧闻奇谭

JIUWEN QITAN

汗青 主编

责任编辑: 张明星

助理编辑: 文康林

责任校对: 廖韧

特约编辑: 孙明新

封面设计: 墨创文化

责任印制: 封俊川

出版发行	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(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)
网 址	http://www.bookej.com
电子邮件	bookcj@foxmail.com
邮政编码	610074
电 话	028-87353785 87352368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40mm × 200mm
印 张	6.75
字 数	14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4-2723-5
定 价	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“常读”系列编委会

(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炜，现为乐钱创始人兼CEO，曾任中国工商银行、国泰君安、IBM、新浪网、凤凰新媒体与和讯网高管。

仲伟志，区域经济专家，原《经济观察报》执行总编辑，现任《投资时报》总编辑。

汗青，历史研究学者，同时也是国内著名古兵器收藏和研究者。

吴声，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，互联网专家。

吴伯凡，学者，作家，杂志发行人。

陆新之，基金合伙人，文化机构联合创始人，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。

张春蔚，阳春科技联合创始人，《财经郎眼》《对话》《等着我》等多档电视节目嘉宾、策划，曾任职于《南方周末》《金融时报》。

孟雷，作家，《经济观察报》社委、总经理。

姚长盛，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骆明，《体坛周报》副总编辑，国际“金球奖”媒体评委，足球专家。

魏航，足球专家，原体坛网总编辑。

你一定很少看书了，因为累；杂志也懒得看了，因为忙。

但你依然在看和读：早起的枕畔，浴室里面，午饭后的瞌睡间歇，临睡前的挣扎，你不时点开的手机屏幕上……

我们不能给你阅读的理由，但我们知道，有些内容可以让你朋友圈更优雅。

我们不能拼接你碎片化的时间，但我们相信，有些阅读可以让你放慢脚步，哪怕只是假装。

目录

001	晚清最后一次文字狱	文/谌旭彬
017	丁戊奇荒：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	文/谌旭彬
030	“公车上书”真相	文/谌旭彬
039	复仇、帮会与中国近代社会	文/苏布谷
074	大汗丧命：钓鱼城改变历史	文/填下乌贼
082	保卫襄阳：南宋的悲壮挽歌	文/填下乌贼
090	十八路反王：造反派的隐秘圈子与往事	文/十二叔
124	清朝的主奴制度与八旗	文/苏布谷
150	满族姓名趣谈	文/苏布谷
165	罗马与迦太基：双雄沉浮记	文/石炜

晚清最后一次文字狱

文/湛旭彬

1903年，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，因为种种“过激言论”而惹怒了朝廷；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，孰料却为租界所阻，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，“降尊”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。这场官司，日后被视作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”。

《苏报》是一份怎样的报纸

自民国以来，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，“《苏报》案”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。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，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——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，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《苏报》，其主观本意，并不想做一份“革命报纸”……

陈范接办《苏报》，欲以文字开启民智

《苏报》早期的历史，因其“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”，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，记载甚少，已无从详查。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，唯一能够确认的，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。其初始创办人名叫“胡璋”，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，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、日本女子“生驹悦”。

虽有“日本背景”，但早期的《苏报》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，所刊消息议论，颇为无聊，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。加之经营不善，亏损颇重，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，胡璋将报纸全盘出让，由一个叫作陈范的举人买下，继续经营。这是《苏报》至关重要的转折点。

陈范系湖南衡山人，本为江西铅山知县，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。其兄陈鼎则因戊戌变法受牵连，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。陈氏由此“愤官场之腐败，思以清议救天下”，遂接办《苏报》。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《苏报》经营，据汪氏回忆，陈范接办《苏报》的初衷是：“丁戊（1897年、1898年）之际，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，君（陈范）私谓余曰：‘中国在势当改革，而康君所持非也，君盍偕我以文字谏国人，俾无再入迷途。’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，此即壬寅（按：应为癸卯）以言革命被祸之《苏报》也。”

如陈范这般，既呼吁改革，又不认可“改革领袖”康有为的种种主张，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。此后，《苏报》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，关注维新改革、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。譬如，1900年1月24日，慈禧下诏立储，拟废黜

光绪，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；《苏报》公然发表反对言论：“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，天下臣民无不向慕，无不爱戴，自戊戌八月政变，无日不翘首北望，期皇上之复权……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，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……呜呼！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”

再如，1901年4月，清廷成立“督办政务处”。所谓“督办政务处”，简称“改务处”，乃清廷为施行“新政”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。然清廷此举，并非真心想要改革，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。《苏报》对此亦有严厉批评（按：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）：“衮衮诸公，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，排斥异己，联络外人，弥缝前隙，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……好民之所恶，恶民之所好，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‘新政’，用来敷衍、欺骗天下……国家孱弱破败，而犹为人所撕裂；民众死亡流离，而犹为人所践踏；这些‘督办政务处’的大臣们，对此虽然耳闻目见，却无动于心……”

开辟“学界风潮”专栏，言论转趋激进

大体而言，《苏报》早期，对于政府和时局，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。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，已不可考，但据汪文溥回忆，刊物也曾一度主张“斥君扶民”，与康有为“保君扶民”的政见有冲突；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，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，以至于“读《苏报》者，辄诧为怪诞，经济乃大困”，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

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，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“学界风

潮”专栏。1902年11月，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。退学的缘起，是学堂内的新、旧之争，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《新民丛刊》等刊物，招致学生不满，结果酿成二百余人同时离校，轰动一时。此后，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。

《苏报》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。譬如，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：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，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，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，这恰如“某报所谓开一窗隙，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，且导之出游，使之领略良辰美景、大块文章滋味，又复从而钳之，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，未之有也”。——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，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，回到旧时代，恐怕是做不到的。

开辟“学界风潮”专栏，专门登载学界消息、刊发学界议论，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当时仅此一家。《苏报》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，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，开始拥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力。同时，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。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，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、教习们一概抨击为“獭淫狗贱之徒”——“此等獭淫狗贱之徒，指不胜屈，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，而欲教育之不坠地，学生之养成有完全人格，其可得哉！”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说：“学堂一日不破坏，学科一日不改良，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，教育永无发达之期。”

革命党希望寻得一个“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”，供其“恣意挥发”

开辟“学界风潮”专栏，与《苏报》想改变自身的艰难境况有关。陈范本非报界中人，办报经验有限；又非名流贤达，社会交际也很有限。这两个因素，直接导致报纸经营很惨淡。一是长期亏损，即便是在“《苏报》案”发生之后报纸销量的巅峰时期，每天也仅能销售一千份左右，而当时的报纸发行量至少要达到三千份才能保本；二是稿源奇缺，以至于陈范不得不亲自出来拉稿，弄得焦头烂额。

“学界风潮”专栏的开辟，似乎恰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。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，1902年4月，蔡元培、黄宗仰、叶瀚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，“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，开发其智识，而推进其国家观念，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”。为帮助这些罢学的青年继续求学，1903年11月，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。随着江浙一带学潮的日增，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所集中的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，除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黄宗仰之外，章士钊、吴稚晖、邹容、张继等激进知识分子相继加入。这些人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，讨论教育问题，发表革命言论。但对这些革命党而言，私下聚会显然是不够的——邹容此时已撰有《革命军》一书，主张驱逐满人、推翻清廷，但苦于没有宣传平台，曾与章士钊商议：

“此秘密小册子（即《革命军》）也，力终扞格难达，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，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，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？”——邹容希望寻得一个现成的舆论平台，以供革命党宣传革命。

章士钊等人最终选择了《苏报》作为宣传革命的“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”，其缘由有二：一是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等，均为成熟的商业报纸，政治上比较温和，不愿报道学潮、鼓吹革命；二是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，《苏报》又苦于稿源匮乏，销路不畅，遂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定约，每日由学社教员蔡元培、吴稚晖、章太炎等轮流为《苏报》撰写评论文章，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，如此既可缓解稿源紧张，又可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。

稍后，陈范进一步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。这是《苏报》成为革命党“机关报”最关键的转折点——此前，“学界风潮”栏目虽然对政府有激烈的批判言辞，但绝无明确的反清、排满言论；自章士钊主笔之后，报纸焕然一新。1903年6月1日，版面大改良，不断发表激烈反清的革命文章。

陈范的初衷，本无意于宣传革命，也并不知晓邹容、章士钊们拟将《苏报》变成革命党机关报的打算。章士钊日后回忆，也承认陈范当日不过是“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，扩其销路”，“而未必有醉心革命”的坚决意志；又说：“余之隐志，向与（章）炳麟、（邹）容私相计划，……全为梦坡（陈范字梦坡）所不及知。”

故而，报纸言论的突然变向让陈范始料未及。6月7日和8日，《苏报》连载了章士钊所撰写的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》。9日一早，陈范就来见章士钊，满面愁容，表示《苏报》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，否则是自取灭亡。章士钊内心有愧，无言以对，本拟辞职。孰料当晚，陈范的态度竟然巨变。据章士钊回忆，陈范再次来到报馆，“出语壮烈，较前顿若两人。并毅然执余手曰：本报恣君

为之，无所顾藉”。

一天之内，如此这般判若两人的态度转折，究竟是何缘故？据说是因为陈范当日碰到了“假孙中山”。这个“假孙中山”真名叫做钱宝仁，本是个流氓。章太炎对此人底细最为了解。据其描述：

“钱宝仁本镇江流氓，积之（龙积之，康有为弟子）在镇江时，曾雇为佣役，后以诳骗银钱一案，投入教会，今又在籍犯法，逃至上海，当张园演说时，满口胡言，自命为三点头目，且与积之书云：

‘尔勿败吾事，否则尔首领不保矣。’以是积之不敢明言。梦坡本有痰病，遂受其诈。常言某处有一金佛，可往取归，一生吃著不尽，而梦坡竟信之，欲以《苏报》交彼办理。幸仲岐窥破其诈，得以保守，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元矣。”

钱宝仁具体如何自称孙中山诈骗陈范，已不可考。但自此之后，陈范不再过问报纸的内容，则属事实。章士钊也因此得以“恣意挥发”。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，章士钊如此感慨：“梦坡之愚陋如此，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，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。又若钱宝仁不骗人，《苏报》未必有案者然。”

近代以来，我们的著史传统，向来不甚重视陈范这种“小人物”，即便偶有谈及，也总喜欢想当然地为之贴上“革命者”的标签。反倒是章士钊对陈范的评价最为中肯：“陈梦坡者，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。彼以对待朋友之温情，偶掌革命之旗鼓，准情酌势，于职实不相称。”辛亥年后，众人皆争相以革命功臣自居，陈范虽因《苏报》案落得个倾家荡产、爱子失踪、潦倒颠沛的结局，却极平和地宣称自己素来主张和平维新，并非革命党——“和平改革之持义，未以颠沛而忘”，其“长厚君子”之风，于此可见

一斑。

《苏报》发表了怎样的言论

与“《苏报》案”的被神化同步湮没掉的历史细节，还有《苏报》究竟刊发了些什么样的言论。诚然，曾几何时，“革命”已经取得了天然的“合法性”，一度成为至高无上的“政治正确”；但在肯定“革命”的同时，笼罩在“革命”光环下的那些刊发在《苏报》上的“革命言论”，在借鉴之外，真的就没有任何值得后世反思之处吗？

捏造《严拿留学生密谕》，挑动满、汉关系

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，俄国曾趁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。其后，中、俄立约规定，俄国军队须分三期从东北撤退。但到了1903年4月，俄国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，反提出独占东三省特权的要求。消息传出，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。4月，汪康年等上海知识界名流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；稍后，北京学生亦发起集会请愿……而表现最激烈者，则莫过于赴日留学生。

4月29日，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召开大会，决议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，奔赴战场，与俄人决战；并致电袁世凯，请求将义勇队暂时隶属于其麾下；同时致电上海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，请求帮助。爱国学社接电之后，亦筹划组织义勇队，以期响应。一时间，国内学生自发成立“义勇队”蔚然成风。

学生中的这种“异动”第一时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。据《苏报》6月5日报道，驻日公使蔡钧曾致电鄂督端方：“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，计有二百余人，名为拒俄，实则革命，现将奔赴内地，务飭各州县严密查拿。”

与上述电报同时在《苏报》刊出的，还有一份《严拿留学生密谕》。《密谕》声称：在日留学生致电袁世凯，以拒俄为名，要求发给枪械，实属居心叵测，“其电该督臣之意，又有诡言俄患日深，求该督助其军火，在日本东京各学生，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。情形叵测。”故而要求“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，遇有行踪诡秘，访闻有革命本心者，即可随时拿到，就地正法”。

《密谕》之外，《苏报》还刊登了张继所写的《读“严拿留学生密谕”有愤》一文，以为烘托。文章极力阐述“汉满不能两立”之义，说道：“东三省者，贼满人之故宅，满人不自惜，而汉人为之惜；东三省为俄人占据，满人不自恢复，而汉人为之恢复，无乃太背人情。”文章忆及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激烈地倡议道：自此以后，“不顾事之成败，当以复仇为心；不顾外患之如何，当以排满为业”。

“《苏报》案”发生之后，清廷并不承认自己发布过这样一道《密谕》，谴责《苏报》肆意捏造。此段公案，真相如何，应以当事人章士钊多年之后回忆的说法为准：“《苏报》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，清廷知之，曾谴责《苏报》捏造上谕，《苏报》却坚称密谕是真，从江督署借钞得来。要之，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，不择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此一迹象，可从《苏报案纪事》字里行间看出。”（《疏〈黄帝魂〉》）

诚然，清廷对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确实采取了压制政策；诚然，清廷确实担忧“拒俄义勇队”变成革命军；诚然，清廷更担忧“义勇队”的称呼让列强想起刚刚过去的“义和团”……但《苏报》捏造上谕的做法，是否就完全没有可议之处呢？

讥讽当局乃真“革命之党魁”，以暗杀恐吓当局

6月7日及8日，《苏报》连载了章士钊所写的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》一文。文章激烈地指责，“革命党”是清廷所制造的，所以，清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员如荣禄、德寿之流，才是真正的“革命之党魁”。文章并以酿酒为比喻，将民众比喻成“米”，将革命党比喻成“酒”，而将清廷比喻成“酿酒之药料”，称酿出“酒”来反归咎于“米”，乃是无稽之谈：“吾今一言以蔽之，革命者非他人之所能为也，其操纵纯在公等。公等今日欲革命则革命，明日欲革命则革命。不观之酿酒乎？酒为米所酿成也，果米自酿成乎？抑有所以酿成之药料乎？试问今日公等之所为，贪戾狠毒，横敛暴征，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。公等自备此药料，日施此药料，而乃归咎于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，是何说也？”

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，其措辞之激烈在当时前所未见。尤其是文章甚至以俄国“虚无党”之刺杀为例，恐吓清廷：“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？公等不读世界史，固无从而知之，吾今言之，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。盖虚无党之性质，专以暗杀为事，一杀不得而再杀，再杀不得而三杀，以第一专制之俄国，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大第二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，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，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

颖，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。虚无党之所以盛者，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，有所以盛之者也。所以盛之者，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。”

宣扬“杀人主义”，呼吁对满人“斩草除根”

6月22日，《苏报》刊出一篇题为《杀人主义》的文章，其强烈的种族情绪、反满态度以及嗜血热忱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文章开篇即说：“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，今吾哢哢号于众曰杀人主义，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！”

文章尤其强调满、汉之间的血海深仇，质问读者：“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？”并号召民众以“杀人主义”为汉人“复仇”“斩草除根”：

“此仇敌也，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，盘踞我土地，衣食我租税，杀戮我祖宗，殄灭我同胞，蹂躏我文化，束缚我自由。既丁末运，沐猴而冠，已不能守，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，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，奴颜向外，鬼脸向内。呜呼！借花献佛，一身媚骨是天成；斩草除根，四海人心应不死！今日杀人主义，复仇主义也，公等其念之。”

作者之嗜血，今日读来，仍然使人不免心惊肉跳：“物各有主，冤各有头，百喙同声，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。数世沉冤，一旦昭雪，将来幸福，试问刀环，杀尽胡儿方罢手，快哉杀人！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通晓中西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，这种视野，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，如此，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。作者如此欢呼“杀人”：“读法